

长篇小说

大盛魁兴衰记

国商



邓九刚 / 著

长征出版社

· 长篇小说 ·



——大盛魁兴衰记

邓九刚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希平

封面设计:刘梁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商:大盛魁兴衰记 / 邓九刚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1. 3

ISBN 7-80015-683-4

I. 国…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948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北京跃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8.25 印张

3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80015-683-4 / I·144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序

周政保

如何评价邓九刚的这部《国商》？我突然想到了评价本身的问题。

在现今的文学界，“引人入胜”与“意味深长”，大约是评价长篇小说思情质地时使用最频繁的两个概念。说某小说“好看”，往往称之为“引人入胜”，而在论及小说的品位及艺术价值时，“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相对多一些。当然，文学界要更看重后者，因为总觉得“引人入胜”的评价有点儿只注重“可读性”的倾向。实际上，这里还是存有一些误解的。在我看来，尽管每一部长篇小说所实现的“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会相同，但“引人入胜”本身称得上是长篇小说艺术的一种高追求或高境界。“引人入胜”的关键是“胜”：倘若无“胜”，谈何“引人”，谈何“入”？所谓“胜”，就是胜境，或就是优越、乃至极尽佳妙的意思，其中也包括了“意味深长”的成分。所以《辞海》释道：“后常以‘引人入胜’形容山水风景或文艺作品的美妙境地。”显然，“意味”不“深”不“长”的“胜”，也只能算是“胜”的“初级阶段”。

从评价本身的疑惑说到对于《国商》的评价，也就可能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恰当的概念，即“引人入胜”，或者说，《国

商》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至于小说“胜”到了怎样的境地,我只能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不过,有一点我敢断定:在中国小说界,《国商》虽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前没有过,当今也没有。作为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其描写的生活是特别的,展现的背景是特别的,刻画的人物及人物性格所蕴含的思情寓意,也同样是特别的。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为了这“特别”的最终实现,作者是费了苦心、花了大力气的,而其中的经略及深厚的积累,也不是短期之内的匆忙行为所可能抵达的。

实事求是地说,《国商》的写法是很传统的。但这种讲故事的传统方式(作为小说叙述形态),其本身并不构成雅俗优劣之类的问题。起码在我的小说意识中,真正的价值(或最终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故事的叙述方式,而在于或主要在于故事所可能的寓意,以及与此相关的接受效应。其实,因为接受与传统熏陶的无可抗拒的关系,小说故事的传统叙述方式反而容易携读者进入作品的胜境(所谓“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之所以有分量,之所以不少描写让人产生怦然心动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故事或故事所传达的“人的过程”的缘故——其中自然体现了叙述方式之于表现的顺应或契合。但说到底,依然在于故事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某种为叙述而叙述的、甚至是追赶新潮的所谓“叙述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作品实现了题旨寓意的传达,并吸引了读者、启发了读者、赢得了读者的思情共鸣,那我们只能认为小说的叙述是成功的,是合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或目的性的。我想,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或掂量《国商》,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及作为背景的某些“史实”的透露——如卷四第三章写到的清政府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在黑海的里瓦几亚与俄人擅签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1879年）；这一章还提到了让小说主人公们感到忧喜参半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由曾纪泽签订，1881年）——读者不难看出，《国商》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那十年左右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是一个国力贫弱的时代，一个因贫弱而饱受外族欺压凌辱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极端腐败的时代，一个面临灭顶之灾、可又回天无力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灾难一直追逐着整个民族的旅程。即便如小说中的“大盛魁”这样的商务集团，实力雄厚、且又倾尽心力地苦苦挣扎，也很难摆脱灾难的笼罩。就如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所言：“朝廷是挺不住的，总有一天顶不住的。”而大盛魁城柜总账房郇先生也称：“颓势难以扭转。”这便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无可抵抗，谁也挽救不了它的没落与最终灭亡。作为“势”，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小说的描写——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刻画及命运的可能性（或悲剧性），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这里所说的“势”，即便是“颓势”或“败势”，也显现出一种艺术传达上的风卷残云般的大气磅礴，一种只有悲剧史诗才可能泛显的，但又被涂上了传统文化色彩的失败者的慷慨或长叹……

小说的这种“势”，其实在《序幕》中已经获得了犷悍、暴烈、饱满、可又十分沉重、寂寥、神秘的传达：一支庞大的驼队，曾经是那样严整、肃穆，那样浩浩荡荡、气度非凡，可在跋涉了莽莽苍苍的亘古荒原之后，却被哈拉沁峡谷活生生地掩埋了，

没留下一点儿痕迹。恐怖的灾难是突发的,然而在这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中,却包含着必然的、由小到大的积聚过程——“驼队”的命运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崩溃覆灭难道不是如此么?“领房”的精神是无畏的,经验是丰富的,祈祷是虔诚的,而商旗猎猎的“驼队”,在“蒙古高原”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逶迤而行的十几里长的阵容,呈示着它的威严、它的声势浩大,可最终还是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作为象征或作为“势”的隐喻形态,《序幕》——哈拉沁峡谷的灾难,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极为简洁的题旨表述、或极为精彩的寓意传达。我想,《国商》所企图实现的思情也罢,民族命运也罢,社会前景也罢,人的生存状态也罢,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也罢,或者是“人的过程”也罢,大都可以在哈拉沁峡谷的恐怖或灾难的秩序中,寻找到相应的基因般的渍痕。

当然,可能体现小说的“势”的叙述特点,还在于描写过程中的那种辽阔的时空纵横。尤其是,广袤的空间与终究渺小的“驼队”、与苦争苦斗的各式人等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更加促进了“势”的生成——无论是叙述的“气势”,还是人的状态或人的过程的“颓势”。小说以塞外的归化为中心,辐射所及包括了乌里雅苏台、沙王领地、库伦、恰克图、山西祁县等等。而笔触所涉,有乡村,有市井,有官府衙门,有礼仪宴邀;有浩瀚的沙海,有无际的戈壁,有苍茫的草原,也有寂寥的驼场……如此广阔辽远的空间,随着故事情节的跳跃与推进,很自然地拓开了读者的视野及想象力。于是,那种多元意义上的“势”的综合印象,也就成为一种难得而又必然的小说效果(最直接的阅读感受)。

可话说回来,无论是“势”,还是小说的题旨寓意,或者是描写的独特性,最终可依仗的仍然是小说的故事,仍然是其中的人的状态或人的过程——作为富有相当容量及规模的长篇小说,是无法藐视或疏离这些主干性因素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叙述就是一切,但叙述是有秩序的,或是由想象确认之后才开始的,而“一切”之中所包含的,不就是故事或故事中的人么?

若论《国商》中的人物,被刻画得最具力度或最富容量及寓意张力的,自然是首推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以大掌柜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坚固而充满了封建帮会色彩的系列人物群体,如郇先生、祁掌柜、古海、海仲臣等(其实还应该包括财东史耀及其儿子史靖仁等)。这部小说的全部意义,就是经由这个人物群体的有层次的描写方得以实现的,或者说,作品的题旨(《序幕》的象征或隐喻),就是围绕着大盛魁的生死存亡,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才逐步趋于完成的。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大盛魁的一些核心人物或重要人物都是一些怎样的人,譬如说,他们各个具有怎样的精神世界与性格特点,就说作为庞大商务集团的大盛魁在故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不得不经受的“严峻考验”,也足以使作品传达出一种思情辐射的浑厚悠远之感,甚至蒸腾起一种让人想起历史、想起现实、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蹒跚的沉重或苦痛的气息。

大盛魁是一个民间商务集团,从财东到掌柜清一色的山西人,除了精于算计或气度不凡之外,与组织严密、规范严酷的帮会团伙别无二致。大盛魁不仅实力雄厚,而且精诚团结,富有智慧,二百年来纵横于以归化为中心的各种商道。无奈

是到了大掌柜王廷相、总账房邸先生这一代“大盛魁”，大清帝国已到了末世的同治光绪时代，雄才大略的文武大臣况且如此，何谈风雨飘摇中的民间商贾？实际上，大掌柜们虽则勤勉吃苦、孜孜不倦，虽则运筹帷幄而决战千里之外，但如履薄冰的状态才是这些“新旧交替”时期的商贾们的真实写照。说穿了，“大盛魁”是从农业社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怪胎：它具有先进的印记，也无可避免地携带着落后的成分，乃至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它只是前行在走向末日的道路上，并竭尽全力与泥泞的坎坷作着最后的搏斗。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眼看就要毁灭——然而，无论怎样的力挽狂澜，也抵挡不住因国力衰败而导致的外患内忧，更无奈于作为国势或国情而沿袭了千百年的“重农轻商”局面。这一切，具有命中注定的意味：不论本事大小，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态势。

“大盛魁”面对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或者说，小说所描写的是“大盛魁”的商务活动，虽是掌柜们的柳暗花明或机关算尽，但它却以极为生动恢宏的形象过程，为近代社会的不可救药或最终覆灭作了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解：不仅仅是“乾坤逆转，世道骤变”，而且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大盛魁遭遇的局势，偶然之中深深地潜藏着“落日之战”的必然。

读者可以感受到，“大盛魁”的图存经略之所以艰难曲折坎坷，原因就在于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不仅具有复杂多元的性质，而且每一种力量都可能置他们于死地。首先是来自强大的外族商人（或兼有政客身份的商人）的渗透与挤压。一方面是朝廷的“重农轻商”，一方面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政商合一”，并以商务为政治手段；一方面是闭关自守、日益衰落，一方面

是野心勃勃、伺机扩张(所谓要建“黄俄罗斯”)。于是,包括谢尔盖、伊万、康达科夫在内的沙俄商贾(或政客),也就自恃国强而长驱直入、为所欲为,可大盛魁则只能时时提防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打击或暗算。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穷邦自慰之言,那就是“弱国无外交”。其实,何止是“外交”?即便是商务交道,也不可能是平等公正的。当然,因了大盛魁是民间商务集团的缘故,也就有了既抗争又笼络的双重性,甚至是某种相互勾结的“沆瀣一气”,譬如大掌柜与康达科夫所实施的那桩走私大买卖。顺便说一句,这笔走私生意之所以历尽惊险,差一点儿祸及大盛魁的根基,表面的原因似乎在官府,可暗中的导火索却在“圈内反对派”的作梗(告密)。不过,鉴于大盛魁与官府、与朝廷内线的密切关系,“走私案”终于化险为夷。

在这部小说中,“走私案”所触发的各种纠葛,仅仅是一种总爆发——其中透露的矛盾,在这总爆发之前或之后就一直发生着或依然延续着。我们不难看到,惟利是图的财东(史耀、史靖仁)与窥伺大掌柜交椅的祁掌柜是如何狼狈为奸、如何阴谋颠覆大盛魁总号的;同时也看到,总号的掌柜核心是如何利用矛盾、抓住时机而实现各个击破的。至于小说中的关于“大盛魁”与官府的奇异关系的描写,更是极为独特精妙的一笔。其中的描写不无荒唐的色彩,甚至充满了对迂腐官吏的嘲弄,但又是接近历史的——不仅为腐败无能的政治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也为“商”与“官”的相互勾结或相互利用,亮出了一道富有现实感的精彩风景。虽说官府因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而不可救药,况且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们也无力顾及诸如大盛魁之类的民间商贾的利益,但“惟利是图”却是末

世官吏们的本能，而且显得更贪婪——大盛魁别无更高超的伎俩，除了处心积虑、吃苦耐劳，便是钱财笼络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任凭心计与勇气即可横行天下的时代。因有了钱财的笼络，大盛魁可以使“道台”甘心情愿地为之劳神操心，为之“办实事”，且做到“侠胆义肝表里如一”。

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大盛魁”的幸运。末世之风中的“大盛魁”之所以仍能维护不溃的姿态，其原因也只能是占尽了这种可悲哀的幸运。当然，此间的状态也仅仅是维护而已，因为坍塌业已成为一种“大势”。何谓“势”？力也，流动之气也。若以“大”字冠之，那就更是无可逆转了。

显然，这就是《国商》以小说方式讲述的历史，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与这一截历史存有脐带般的血脉关系，至少可以说，它曾是我们的摇篮——那是发育商业文明的摇篮，那是浸透先人血泪的摇篮，那是沉积生命过程及人性呼号的摇篮……我想，昨天是不可忘却的。

最忘却不了的是人。

大掌柜、邵先生、祁掌柜、古海……都是一些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人物。在他们的性格中，拥有独特的气质内容，以及那种只有中国商贾才可能具备的行为方式或洞观人世的眼光。他们敬业勤勉，吃得下大苦，做得了大事；他们恪守规范，肯于约束自己；他们意志坚强，遇险不惊……多年的滚打锤炼，养成了丰富的经验与可靠的判断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狡诈品性，特别是因了拼搏争斗的激烈多变，也使他们在世态的冷酷中平添了几分处事的无情，甚至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譬如，大掌柜为了“大盛魁”眼前的或以后的利益，可以杀人灭

口，可以把忠心耿耿的海仲臣送入地狱；又如，祁掌柜为了尽早坐上大盛魁第一把交椅，可以与利欲熏心的财东们结成一条战线，可以阴险无耻地向官府告发大盛魁的“暗房子”秘密勾当，或者说，只要合目的性，便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与祁掌柜“搭档”的史耀、史靖仁父子，虽然落墨不多，但人物的无德无才，却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他们仅是沿袭祖荫，可又贪得无厌，于是只能依仗玩弄诡计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类似于史耀、史靖仁这样的人物，不仅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在今天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潮流中，他们的面孔也并不显得陌生。财东与掌柜的矛盾，虽则表现为钱财的计较，但实际的容量要比钱财之间的冲突丰富厚实得多：它同样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动荡，一种首先发生在经济结构内部的摇晃，或一种特定生存环境下的人性过程。

与史耀、史靖仁父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小说主角之一的古海及其父母亲。先说古海——他是贫寒子弟，机敏而又懂得发愤；他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勤恳忠诚地从最底层做起。他做得很成功，环境为他提供了一座又一座展示才能的舞台。尽管他苦熬九载而招来横祸，但可以相信，“开销”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他已经练就了大盛魁掌柜的身手，东山再起仅仅是迟早的事。在《国商》中，古海是学徒，或因了他是“初试锋芒”的缘故，所以也不可能如大掌柜一般呼风唤雨，或如郇先生那样举足轻重，但他在小说构造中的地位及艺术作用，却绝不亚于其他人物、哪怕是极见性格的重要人物。他是旁观者，又是直接的参与者。他的存在便是小说。离开了他的“故事”，也就等于从结构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他既是小说的重要人物，又是小说的重要线索。可以说，一旦失却古

海,也就意味着小说的全面崩坍。古海作为小说中的贯穿性人物,其重要性还表现在:作品对于这个并不惊心动魄的人物的精心刻画,同时也意味着是对其他人物性格的塑造或逐步完成,譬如对于大掌柜。《国商》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小说以生动沉着的笔触塑造了大掌柜这样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富有末世特色的中国商贾形象——大掌柜的刻画,同样也离不开古海所起到的艺术作用:就阅读印象而言,我们在感受古海时,经常可以感受到大掌柜的存在,尽管大掌柜并没有出场。大掌柜是一个商贾形象,同时又是一种彼时彼世的精神形象。显而易见,小说也没有把他作为纯粹的商贾来刻画。大掌柜苦心经营几十年,依仗自己的实力、谋略,以及谁也不可忽视的影响,致使自己的精神无处不在,上至官府朝廷,下至所属掌柜。他对学徒们的铸造,便是其精神的一种再现或重塑。古海九年苦熬,大掌柜便是他朝圣与接近的精神形象。这是一种过程,一种可以被称为生存状态的“人的过程”。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地承袭与重显大掌柜精神的过程。《国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古海精神成长过程的不动声色的揭示。

在这里,既不是歌颂,也不是鞭挞;《国商》只是以小说的方式,对一截历史或对一种“人的过程”作了属于作家自己的穿透与展现。自农而商、从商而溃,其中构成了一种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极其无奈的历史循环。大盛魁的掌柜们清一色地来自农业社会(也只可能来自农业社会),而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无疑可以造就小说传达的极富意味的契机。就《国商》而言,古海是最具这一角色特征的人物。他从山西祁县到塞外商贸集城归化,其自身就是这种角色转变的体现者;不仅如

此,他还是一座寓意上的桥梁:由于他的存在,才可能勾连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的那种有机联系,才可能把农民的梦想、并连带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乃至造房建屋之类的追求统统推到读者的面前。小说对于古海父亲古静轩(也包括古海娘、古海妻、张婶等)的描写,很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深度或厚度。不管有意无意,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从古静轩们的生存状态及梦想中,感受到土壤深厚的农村文化底蕴是怎样波及到一种新的社会文明的生长,以及新的社会文明如何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妨碍自己前行的旧式印记。于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倾听到些许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沉重声息,而这种声息并没有因历史久远而失却让人进一步沉思的现实感。

历史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突然消失。历史总是表现为承袭与发展。历史没有尽头。今天也会成为历史,但今天首先是历史的结果。

从小说中的故事及人物的命运可以见出,“大盛魁”还将经历风雨的飘摇或洗礼,“大盛魁”的掌柜们也将蒙受新的苦难或新的打击。特别是古海,他的道路、乃至他的悲壮,似乎仅仅开了个头……于是可以说,《国商》要讲述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但即便是已经发生的人事变迁,也足以构成一幅规模宏大的十九世纪的商贸图了;同时,它又是一幅富有命定色彩的民情风俗图——它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窗口,而且也有了一次重新理解我们自己——无论是国情民情还是“人的过程”——的庄严机会。

我想,这才是《国商》的“引人入胜”的“胜”处或“胜”境。

一部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

□ 何孔周

记得许多年前，在首都知识界曾经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进行过比较研究。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大家极想搞明白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次改革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那次讨论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是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我国的戊戌变法无论对于日本还是中国都至关重要，它们发生在同一个时代，有着极为相似的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就像两个历史的路标指引亚洲的两个相邻的国家使他们一个走向强盛一个滑向衰落。

事隔许多年，当我阅读《国商》的时候，这件事情又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记忆。这是因为《国商》以小说的方式形象有力地给那场讨论做出了回答。由此可见，作家的思想十分敏锐而又犀利。在思想性上没有独到发现的作品，无论你在技巧上是多么的新潮、多么令人眼花缭乱，其成就都是有限的。新时期以来，当我们刚刚从旧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不少作家更多地把眼光和精力投向艺术手段上的革新，这固然有其积极的文学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不少作家疏淡了作品的思想性这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因而造成新时期文坛虽然纷繁

热闹但巨著难觅的尴尬现实。而《国商》的作者有眼光也有魅力,敢于拨开历史的迷雾把一段被人们长期冷淡和歪曲了的历史重新挖掘了出来,这说明作者具有独特的眼光与胆识。真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必须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终究难以成为传世之作。邓九刚在《国商》中所做出的努力让我们感到振奋。

《国商》是一部男子汉式的作品,给人一种雄性的力量之美;苍凉遒劲,广袤无垠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格调。在写法上也有一定的特点:以传统现实主义为主,同时又吸收了不少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从总体上看语言遒劲沉郁,但又不乏色彩与灵活。《国商》创造性地以独特的地域和历史背景,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典型地反映了19世纪中末叶我国北疆的民族商业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险恶环境中竞生图存、艰难发展的经历和命运。既艺术地概括了兼及农村、城市、草原以及俄罗斯诸多生活层面的历史生活内容,又潜隐着能够触发读者共鸣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在叙事方式方面、风土人情和人物性格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都烙上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从明朝末年资本主义在我国产生萌芽算起,经历了清王朝的社会倒退,又经过了近代中国,列强瓜分的痛苦过程,直到民国,中国资产阶级一直是处在一种被压抑的恶劣的环境中挣扎图存寻求发展,她所走过的道路极为艰难曲折。几百年来尤其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所走过的困顿历程充满了血泪和悲情,照说这段历史本应该成为文学家大展思情的领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却非常遗憾地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歪曲与遗忘。《国商》的作者以敏锐的文化眼光发现了这一点,并以

自己的艺术实践填补了当代文学史上这一页本来不应该疏漏的空白。这是作者的一大功绩。

《国商》写到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像《中俄里瓦几亚条约》、《中俄库伦条约》等等。这些都使得作品的历史感和厚重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丝绸之路,名扬四海。《国商》的作者用他多彩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了另一条横贯欧亚的伟大商路——茶叶之路。这个题材的发掘本身就不同凡响,就具有史诗的意味。

从空间上看,以着墨最多的塞上商城归化城为中心(即现今的呼和浩特),作家的笔触一直深入到了茫茫的喀尔喀草原深处、俄境的伊尔库茨克和欧洲的历史名城莫斯科。难能可贵的是,广阔的空间画面有条不紊地分成若干层次逐个展开的。作品笔触所到,有乡村、有市井、有官府衙门、有苍茫的草原、有寂寥的驼场、有浩瀚无垠的沙漠……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

作者对历史尤其是晚清我国北方的经济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阅读中时时可以遇到令人可玩可品的精彩段落。所有这些都使小说的可读性得到了加强。

作者的思考无疑是较为深入的,也是有力的。但是《国商》失误在于理念强于形象。而且,小说在丰富性上,在人物的文化心理的挖掘上也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提出这些要求,我只是愿他做得更好,这是因为《国商》已经证明了他是很有希望的。

原刊于《光明日报》